

中國政治動向之
史明考察

姜在剛著

姜蘊剛著

中國政治運動之史考察

15
江
才
の
に
お
年
に
月

中國政治動向之史的考察

實價四元

有 著
作 權

著 者
發 行 所
分 銷 處

姜 蘊 剛
上 海 威 海 衛 路
大 華 書 局
各 省 大 書 局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再版

自序

書中各篇均爲今年在各雜誌上新發表的，第一篇及第二篇載在南京大道月刊第一卷第二號及第四號中；第三篇及第四篇載在汗血月刊二卷六號的『實幹人物專號』中；第五篇載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的『三十周年紀念號』中；雖各自獨立發表，其間有連貫性，因爲皆是考察中國政治史中的東西。

前兩篇是言民本思想及法治問題，民本與民治，在作者是有區別的，所以與後三篇所論并不矛盾，惟此皆史實之指明，善讀者當能有融會貫通之認識；惟此認識然後可以看清中國政治此後之動向，也惟此然後能把握着中國政治之時代精神。作者不欲隔外多發空論，亦不欲拘拘於政治原理及某種政治主義之喋喋，頗願爲此史的考察，以供獻於今之賢者之研究；國事至此，政治紊亂，此豈無由？

後三篇，作者本有單獨印行一書的意思，因中國政治史上，惟管仲商鞅與李斯是最

傑出的三個人物，在他們之前，半爲傳疑時代，雖是周公旦所立規模之雄偉，已難考證；又在他們之後，很難有及他們之氣魄和創造性的；所以一部中國政治史，他們三個竟是重要的臺柱了。如無這三個人，讀者試想中國政治史又該如何寫？

我之推稱管仲商鞅及李斯三人，決非表面上所指之氣魄與創造性，其切要點還在他們能認識環境與國民性，所以他們立的方案竟能成功而爲支配了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力量，我們豈可不特別的去研究他們？

不懂得管仲商鞅及李斯三人的，可以說不會懂得中國過去的政治；忽略了管仲商鞅及李斯三人的，也可以說不會理解中國政治的命脈所在；所以我以之合着前兩篇而仍名我之書曰中國政治動向之史的考察，理由就在這裏。

向來發表東西，我都比較少用本名，如第一篇發表時書宋鶴笙三字，第二篇又書君兩字，其餘各篇亦皆臨時隨便寫上兩字或三字等等，皆無何種意思，因此類論文決不引起何方善惡之感，亦無爲人搜集印成專集的『危險』。以被人索稿時，有稿奉報，用

名時則有其名就夠了。此書印行，怕有人疑爲有姓宋等的東西竄入，所以要聲明一吓。

再，前兩篇是今年在上海臨時寫的，後三篇的初稿都是三四年前在北京所寫，曾經在北平大學法學院及河南大學講中國政治思想史發過講義。惟李斯一篇最早應天津白河週刊之催索發表過，後來自己在開封主編社會科學轉載過一次，這次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是脩正稿了，這也應該加以聲明。

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作者於上海

中國政治動向之史的考察目錄

自序	一
中國政治動向之史的考察	一
法治問題之史的考察及其價值性	一五
開創霸業政治的大政治家管仲	二五
獨裁政治的肇始人物商鞅	六二
統一中國政治之前導者李斯	九三
後語	一二

中國政治動向之史的考察

自海禁大開，吾民族思想，不安故常，初有戊戌政變之維新，繼有辛亥革命之爆發，民八之五四運動，民十四之五卅慘案，皆爲中國國民對於過去之不滿，發生種種改革之企望，姑無論何方面之變動，終歸爲中國民族圖謀新出路，固無可懷疑者。日本在明治維新前與中國此刻情形完全一致，但自其鎖國令撤消之後，朝野人士，均抱定對外不違背世界潮流，對內不抹殺民衆幸福，共同奮鬥，遂有今日。中華民國成立二十餘年，以言對外，國土日削，以言對內，民不聊生，而嘵嘵然者仍以吾國民族未能效仿歐美各國爲憾。然中國民族本爲獨立之民族，中國人民本爲自主之人民，惟以地較廣闊，歷史較久，交通既不利，教育又未普及，故開關以後，外力一入，遂使國情忽爾迷亂，民衆認識參差，有如紛絲，愈理愈亂，因頭緒未得，只在痛癢不相關處着手，宜乎國勢有今

日之不振也。居嘗思之，皆由於中國固有之民族性與歷史環境不認識所致，所以熱心政治者固舉棋不定，時此時彼，曰左曰右。而當國權者，則又常以中國人民之宜高壓與專制，洪憲之出現，其實例也。中國民族果何如乎？中國政治動向宜往何處去？是則非有史的觀察與認識不可，非如此不足以言改革政治，亦非如此，不足以使中國政治有大路可依循。

二

余嘗於大學，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，謂中國之書經一書可爲啓蒙時代政治之產品，其中所包含有兩種特質：卽天治主義與民本主義是也。天治主義在人羣進化中，大約皆必有之階段，惟天治主義在中國與其他民族有異，卽天治主義思想中已隱示有民本主義之傾向。他民族率皆以天之化身爲君主，而中國則以人民爲天之化身，如洪範中云：『天子作民父母，以爲天下王。』臬陶謨云：『天聰明，自我民聰明，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。』泰誓云：『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』又云：『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』

而所謂君主則不過天命之爲民服役。故秦誓又云：『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其克相上帝，寵綏四方。』此等語在書經中甚多，其如五子之歌所言：『民爲邦本，本固邦寧。』則固明言民本主義之精神也。所本於民而民所欲者又爲何？則『德』是也，太甲下：『德惟治。否德亂，與治道罔不興，與亂同事，罔不亡。』咸有一德：『非天私我有商，惟天佑於一德；非商求於下民，惟民歸於一德。』多方說：『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』德者得也，有所得則民安；安卽民之福。法儒孟德斯鳩言：『需威而成專制，需法而成立憲，需德而成共和。』共和則民無不樂，斯又民本主義之精義所在，爲最不可忽者。如詩經中板蕩篇亦云：『先民有言，詢於芻蕘。』詢於芻蕘者，卽執政者常通於民情之謂。鄭漁仲於六經典論中於此輿感曰：『是故湯武之興，其民急而不敢去，周之衰，其民哀而不敢畔，蓋其抑鬱之氣紓，而無聊之意不著也。嗚呼，詩不敢作，天下之怨極矣，卒不能勝，共起而亡秦，秦亡而後快，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。』漁仲史家，以詩觀時，推言民本主義之衰敗，在於人不敢作詩，人不敢作詩則抑鬱之氣

不紓，而無聊之意蓄，從茲天下常以一人存亡之權而治亂。其威嘆深矣！雖然，而民本主義之思想并不因以中絕，觀於國語所言，其意益顯。國語中云：『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，川壅而潰，傷人必多，民亦如之，是故爲川者，決之使導，爲民者宣之使言，故天子聽政，使公卿，至於列士獻詩，瞽獻曲，史獻書，師箴，瞍賦，矇誦，百工諫，庶人傳語，近臣盡規，親戚補察，瞽史教誨，耆艾脩之，而後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』凡此總結爲中國初期政治民本主義思想之表現。周厲王欲使人監謗殺言者，終被民逐於幽，可爲事實之證。

三

先秦思想，率多事實之反映，百家爭鳴，多得一察焉以自好，然皆有一共同認識之點，亦即民本主義思想是也。好說無爲之老子亦嘗云：『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，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不善之。』世以老子主愚民，於此其將何說？又曰：『貴以賤爲本，高以下爲基，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，此非以賤爲本耶？』又言：『天下多忌諱』

，則民彌貧。』均置念以民爲本，戒有專制之君主。至莊子則其言益明，莊子曰：『古之君人者，以得爲在民，以失爲在己，以正爲在民，以枉爲在己，故一形有失其形者，過而自責。今則不然……』又曰：『聞在宥天下，不開治天下也。』於賤視君主之極而乃主張完全讓民自由，此可視爲民主主義思想之極致也。於儒則有『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』之大同理想。其在論語中云：『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』儀徵劉光漢氏釋之曰：『孔門之論政，厥有二端：一爲君臣間之關係，一爲君民間之關係。上古之世，君不獨貴，臣不獨賤，既設君以治天下，復設臣以爲之佐理，國爲君臣所共有，豈有尊卑貴賤之可分？孔門知其然也，故論語之言君臣，皆以君臣并舉，其對定公之問也，則曰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對景公之問也，則曰：「君君臣臣。」答與邦之問也，則曰「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」推孔子之意，豈非抑君主之尊？而重執政之權哉？此孔門論君臣之關係者也。春秋之時，民權漸失，民約之義，蕩然無存，而蚩蚩者氓，復愚昧無知，安於卑下，孔子非不知民權之可重，特以立法之初，當視人民之程度，

處民智未開之世，與其以治國望之民，不若以愛民望之君，而君之愛民又以結民心爲最要。孔子言：「民無信不立。」又言：「信而後勞其民。」與盧氏（Rousseau）所謂君主下順輿情，人民必愛而敬之者，若出一轍，故有若之對哀公，亦陳君民一體之意，此孔門論君民之關係者也。雖然，孔子之道，在於貴公，（見呂氏春秋）而貴公之旨，在於忠恕。論語云：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又言：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皆孔門忠恕之旨，恕爲推己及人之意，至於推己及人，則公私之界悉泯矣。公私之界泯，故能公好惡於民，能公好惡於民，即有公天下之思想，此孔子所以稱舜禹之於天下而不與焉。漢儒謂相人偶爲仁，殆知此意，大道爲公一語，豈非孔門學術之代表哉？孰意隋書以來，學者惑於尊卑之說，如韓愈之流，大背孔門論政之旨。其言曰：「君者出令者也，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。」自韓氏之論出，而君主有權利無義務，人民負義務而不享權利矣。公理消亡，莫斯爲甚，於此而託爲孔門之學，吾不信也。」劉氏之言，於孔門論政之旨可得其要，大學中卽言

：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」此與老子聖人無常心之言蓋同。至於孟子，則民本主義思想，如聲光之出於雷電；可以喧赫萬古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，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此種君臣對等關係之言，尚未盡其旨，如言：「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！」方足以知君民之所謂，故其言曰：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」有土地無人民固不得謂之一國，有君主而無人民，則更無所謂國也，是以言民爲貴。墨子之言曰：「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，生於無政長，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。」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：不止此而足矣，曰殺不辜者，天子不祥。不辜者誰也？曰人也。予之不祥者誰也？曰天也。若天不愛民之厚。天胡說殺人不辜，而天子之不祥哉？此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。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，不止此矣。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，得天之賞者有矣。憎人賊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罰者，亦有之矣。」墨子思想被人視爲神權主義者，實則墨子同於聖經時代之思想以天而

說民，愛民卽所以尊天，政長之所以必選天下之賢可者，亦以賢者而能愛民也。由民而選政長，政長卽民之本身，有同於近世代表主義政治，則可曰民主主義思想，誰可否認之？於法家，則管子其始祖，管子曰：『政之所興，在順民心，政之所廢，在逆民心。』『人主之所以令則行，禁則止者，必令於民之所好，而禁於民之所惡也。』管子固法家，故又曰：『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，此之謂大治。』是卽近代民主主義所標榜者曰：『無論何人，在法律之前，一律平等。』皆從法，平等也。商君號爲刻薄寡恩，而其言曰：『堯舜之治天下也，非私天下之利也，爲天下，位天下也。』呂氏春秋爲總結先秦各家思想之書，復又爲開拓秦漢以後思想之淵藪，在言政要旨，亦於民本主義思想極爲留意，曰：『羣之可聚也，相與利之也，利之出於羣也，君道立也，故君道立，則利出於羣。』又似不滿於始皇之爲己，而乃明示之曰：『置君非以阿君也，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，置長官非以阿長官也。』始皇之必欲天下皆阿諛之，此反民本主義也。民本主義思想，在中國無時或斷。在各家言論中，俯拾卽是，實無足奇。在秦漢以後天下之權每存亡

於一人，然在民衆思想固未嘗以之爲是，始皇及始皇以前無論也，始皇以後其思想源流，復愈激愈張。

四

董仲舒曰：『故夏無道而殷伐之，殷無道而周伐之，周無道而秦伐之，秦無道而漢伐之；有道伐無道，此天理也，所從來者遠矣。』此意語之於日人則不甚可解，其不可解者以君之不能伐也。而能伐君則證中國人向無尊君之思想，此意日本學者曾屢道之。仲舒又曰：『且天之生民，非爲王也，而天立王以爲民也，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，天子之；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。』此卽所謂有道無道之天理，其爲言民本主義思想當無疑。劉向所言，大約與之同，曰：『夫天之生人也，蓋非以爲君也，天之立君也，蓋非以爲位也，夫爲人君行其私欲，而不顧其人，是不承天意，忘其意之所宜事也。』班固曰：『不能愛，則不能羣，不能羣則不能勝物，不能勝物則養不足，養而不足，爭心將作。』董劉班等時代背景相同，故其言均有對是時政治有諍勸之意，及唐宋，政治時代

已有變遷，然其意旨固猶同於漢人，故有發言，大約不遠，如東坡上皇帝書云：『人主所恃者，人心而已。』『人主失人心則亡。』『是故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，先觀衆心之向背。』謂此直同於孟子思想而未改亦可。孟子曰：『左右皆曰賢未可也，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，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然後用之。……故曰：國人殺之也。』此雖非近代人所希冀之直接民主政治，然果實現，似又較近代各種制度政治爲周到有效率，此種理論之事實基礎，乃爲朱子所道破，朱子曰：『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私有也。』延至亡宋，遂有宋牧心之伯牙琴一書傳世，君道臣道等篇實爲明末黃黎洲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等篇之張本。宋黃皆亡國遺黎，西臺之哭，同其悲憤，故發爲文章，皆深恨民賊之害天下，而忘中國有史以來，其治國安民舍民本主義不可也。宋亡於元，明亡於清，元清皆異族，異族何以能亡我？乃我之無道；無道云者，反民本主義而行之，不至滅亡，曷能止已？荀子曰：『力不若牛，走不若馬，而牛馬爲用何也？人能羣彼不能羣也。』又曰：『君者善羣者也。』君何以能善羣？則必愛羣利羣而羣歸之也。白虎通云：